

# 从“劫掠语言”到“解放能指”： 罗兰·巴特破解“神话”的思想转向

于子然

(云南大学 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罗兰·巴特将“神话”定义为“言说方式”，并以索绪尔符号学理论分析“神话”，从而认为当代神话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劫掠后的语言。借鉴语言学理论，巴特提出构建符号链，以“劫掠语言”作为破解当代神话的手段。在文本理论发展、“五月风暴”事件爆发、解构主义思想兴起的综合影响下，巴特反思了“劫掠语言”的理论，并提出打破能指与所指的固定关系，强调写作与阅读活动的愉悦和极乐，最终以“解放能指”的方式抵制当代神话。

**关键词:** 罗兰·巴特；神话集；解放能指；符号学；索绪尔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 I106; I0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5639 (2020) 04 - 0124 - 09

**DOI:** 10. 14091/j. cnki. kmxyxb. 2020. 04. 021

## Roland Barthes's Thoughts Turning to Resist Myth: From "Despoiling Language" to "Liberating Signifier"

YU Zir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091)

**Abstract:** Roland Barthes defined myth as a speech way and analyzed the myth by using Saussurean semiotic theory, and thus contemporary myth is the language after the despoiling of bourgeois ideology. Barthes borrowed from linguistic theory and proposed to construct a new symbolic chain to break the contemporary myth with the purpose of despoiling the language. Under the combined influ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ext theory, the outbreak of the May Storm event and the rise of Deconstructivism, Barthes reflected and criticized the method of despoiling language and proposed to break the fix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gnifier and signified. Barthes advocated the pleasure and bliss of writing and reading activities, and finally resisted contemporary myth in the way of liberating signifier.

**Key words:** Roland Barthes; mythologies; liberating signifier; semiotics; Saussurean Linguistics

1954 至 1956 年间，法国结构主义学者罗兰·巴特应《思想》《新文学》等杂志的约稿，引用索绪尔语言学的部分理论对当时法国社会的热门话题（其中包括报纸的专栏报道、杂志的摄影照片、上映的电影、受欢迎的戏剧表演等等）进行解析和评论。巴特对这些被其称为“神话”（myth）<sup>[1]139</sup>的热门话题批评饶有趣味且较易为读者理解。但如乔纳森·卡勒所言：“这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巴特所说的‘神话’究竟指什么？”<sup>[2]24</sup>

卡勒也曾尝试总结“神话”的内涵，他认为巴特将那些看似自然、实则包含某种意图的社会现

象称为“神话”，是指一种“有待曝光的欺骗”，但其范围并没有涉及日常生活的一切，而仅是一种交流形式、一种表征方式。<sup>[2]24-31</sup>换言之，卡勒所理解的“神话”是通过交流、表述等行为所达成的具有目的性的欺骗。但卡勒也意识到自己的总结难以囊括“神话”在巴特思想中的全部内涵，因此他坦承“神话”的意义在巴特的思想中是变化多端的。<sup>[2]30</sup>

事实上，巴特曾明确地说明了“神话”在他笔下的含义，并且其定义与“神话”在词源上的含义是一致的：“神话是一种言语。（Le mythe

收稿日期：2020 - 03 - 23

作者简介：于子然（1995—），男，云南昆明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审美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estune parole. )”<sup>[3]181</sup>神话 (myth) 一词源于古希腊词 “mythos”，其意义为“语词”“言说”“虚构故事”<sup>[4]</sup>“言辞”<sup>[5]</sup>。巴特在此所说的“言语” (parole) 来源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在索绪尔那里，言语 (parole) 是与语言 (langue) 相对的概念，语言是表达观念、思想、意图的符号系统的社会规范，而言语则是个人运用语言规范表达具体意图的活动及其活动的内容。<sup>[6]</sup>但是，语言与言语在巴特的“神话”理论中并没有像索绪尔一样强调社会性与个人性的对立，相反，这两个概念以及“话语” (discourse) 都是指一种“意味深长的意义合成” (significant unit or synthesis)<sup>[7]109</sup>。

巴特指出，他对于“神话”的定义并不是为了定义这个词语，而是为了指代一些事物。不过，巴特用“神话”所指代的范围十分广泛，无怪乎卡勒认为这是一个变化多端的词汇，其中既有虚假夸张的摔跤表演、电影演员的装饰物、作家纪德的照片、肥皂粉广告，甚至还有脱衣舞秀、葛培理牧师的电视节目、马龙·白兰度的婚姻报道……

的确，巴特认为一切事物都可能成为“神话”，因为世界的一切都可能从封闭、缄默的存在中以言语表达的方式释放出来，世界的一切在巴特眼中都可能是被言说的对象；但“可能”并不意味着世界的一切就是“神话”，他也为“神话”划定了界限：“神话”是一种表达的形式而并非某个具体的对象。所以，那些表演、照片、广告、电视节目、专栏报道之所以成为“神话”，并不在于它们凭借什么载体而传播，而是在于具体的表达方式。

在对神话的表达方式进行分析时，巴特借用了索绪尔语言学中能指与所指的理论，并以代表激情的玫瑰为例说明了作为能指的玫瑰与作为符号的玫瑰是截然不同的，但他还同时强调了能指与符号的不可分割性。巴特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重新阐述为其后的神话表述分析做出铺垫，因为语言学中的符号在神话这里变成了一个空洞的能指；即神话是语言学中能指与所指之外的又一个符号系统，而这个新的符号系统（神话）的能指即是语言学中一个意义完整且兼具能指与所指的符号。在神话系统中，神话抹杀了作为能指的符号在语言学范畴中的意义，使其变得贫瘠且空洞。

巴特在神话系统中提出了将作为能指的语言学

范畴内的符号转变为空洞能指的一个重要因素——概念 (concept)<sup>[3]190-194</sup>。概念先于神话系统中语言学层面的能指与所指而存在，概念扭曲了符号意指作用的所指，并将一个符号变为神话的能指。如果与语言学系统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的话，巴特依然信奉索绪尔所认为的符号学层面上能指与所指对应之间的任意性，而这种任意性一定程度上即是巴特所说的自然性；但神话系统却明显地与之相反，神话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因为概念的先行植入而变成了理据性的、历史性的关系。概念意味着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中，对于某些符号所产生的特定理解，例如在那张著名的“法国黑人士兵朝法国国旗行礼”的照片中，正是已经先行存在的概念“无论何种肤色的法国公民均热爱着这个国家”使得这张照片掩盖了法国的殖民主义政治色彩，从而形成了关于法国民族性的神话。“概念”的提出表明巴特的神话研究不仅仅是形式科学层面的符号学研究，而且更是历史科学层面的意识形态研究。<sup>[1]143</sup>

出于哲学地解释人类观念形成过程的目的，法国哲学家特拉西创制了“意识形态” (ideology) 这个本不含褒贬意味的术语；直到法国皇帝拿破仑轻蔑地将其对立面的批评者称为“意识形态家”之后，这个哲学术语具有了明显的贬义。但巴特既不是从特拉西，也不是从拿破仑的立场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术语的。

巴特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使用“意识形态”的。除了对其“神话”批评进行理论总结时频繁地援引马克思经典——《德意志意识形态》外，巴特不仅认为自己很早就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还认为自己仅能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思考政治问题。<sup>[8]122</sup>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大量地援引历史领域、经济领域的事例，旨在强调那些与语言相关涉的意识形态并非是诸如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精神”等一类形上学理论的产物；意识形态是人类物质生产、物质交换等生命活动的产物。

而巴特保持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口吻，继续向资产阶级猛烈地开炮。巴特认为这些与语言交织的意识形态的言说——“神话”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传播、渗透其生活模式、

生产模式的谎言并借此拉拢那些摇摆不定的中间阶级。神话使得原本不属于资产阶级的中间派们也沉溺于资产阶级纸醉金迷的梦中。

法国学者菲利普·罗歇注意到了巴特所使用的“神话”一词含义复杂,在他看来:“神话”是显示巴特思想变化的一条线索,这条思维跳跃的线索不顾理解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断裂,反而维系了巴特思想的完整性。<sup>[9]</sup>罗歇强调了“神话”的意义在巴特思想中所发生的迁移,而意义的迁移正是卡勒难以理解巴特“神话”所指的根源。

“神话”意义迁移很直观地表现在巴特同一作品的两个不同版本的序言内容中。1957年,法国色伊出版社(Seuil)出版了巴特对法国社会热门话题的批评合集——《神话集》(*Mythologies*),巴特在序言中表示:通过对社会时事现象的探究后,他(巴特)开始以系统的方式破解大众传媒中的“神话”,并且这种破解“神话”的方式可以捕捉到资产阶级在大众传媒中抱有宣传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等企图的虚构性叙述。<sup>[3]9-10</sup>

1957年的序言表明巴特认为运用符号学理论破解当代社会“神话”的方式是获取真理的条件。然而当1970年《神话集》再版时,巴特却表示:他(巴特)已经放弃了对《神话集》的修改,伴随符号学理论的发展,《神话集》中的符号学分析方法已经不能满足新的学术标准和社会需要了。<sup>[7]8-9</sup>比较两个版本的序言内容,可以发现巴特的思想变化:在1957至1970年间,运用符号学理论破解当代社会“神话”的方法从获取真理的条件变成了不合时宜的批评手段。巴特对此几乎倒置的评价态度已难以用罗歇所说的“迁移”来形容,这恐怕更接近于彻底的思想转向。

1971年,巴特写作了与《神话集》理论总结部分同名的文章《今日神话》(*Mythology Today*),并在其中进一步谈到了“神话”理论的转向。巴特指出:曾在《神话集》中提出的神话理论已难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我们不得不暂时停止那种将意识形态从措辞中抽离、将所指从能指中抽离的研究方式,因为这种研究方式本身已经成为新的占统治性的话语,甚至一个完全没有阅读过马克思主义作品的学生都可以叫嚣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种种罪恶;现在我们需要拆解符号本身,

而不是意识形态,从而达到解放能指的目的。<sup>[10]65-68</sup>但如果想要深刻地理解巴特破解“神话”的思想是如何最终指向解放能指的,这恐怕得先回溯到巴特在《神话集》中提出“劫掠语言”的破解神话的手段。

### 一、破解“神话”的最初手段:劫掠语言

在《神话集》结尾,巴特写作了对于神话的认识、破解方法、意识形态等相关方面的理论文章。其中,巴特的神话观念继承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观点:人类的语言将处于存在状态中的沉默且封闭的事物释放出来,因此这些经人类语言释放出来的事物也烙上人类社会的痕迹,神话是依赖于人类社会而存在的,人类社会是神话的根源,神话并不是处于存在状态的事物的涌现,而是一种为人类所选择的言说方式。

但神话到了法国现代社会不仅仅是以口头语言、书面语言的形式加以呈现的,图像、甚至行为本身都属于神话的范畴。特别如图像一类的表意符号,它传递意义的方式是整体性地呈现,但接收者在解读图像时,却又不可避免的借助语言工具层层展开。概括地说,在巴特看来,这些涉及意义传递的符号不免在传播过程中借以语言解读,故将其纳入言说性质的神话范畴是情理之中的。

在神话理论中,巴特改造了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他认为符号学范畴中被理解的对象不是两项——能指与所指,而是不同的三项。因为在能指与所指被理解的过程中,并非是线性的先存在了能指,之后能指指向所指,而是能指与所指之间任意性的相互关联,进而形成了能指与所指结合的第三项——符号。巴特在此的区分是为了其后的神话系统做下了铺垫,于是他着重强调作为符号的某项事物与作为能指的某项事物是截然不同的,例如作为象征激情的符号的玫瑰与作为能指的玫瑰是截然不同的。

这样对符号与能指的区分,其目的是为了揭露神话的某些特性。因为在巴特的理论中,神话是在能指、所指、符号这三项组成的符号学系统基础上建立的新意义系统。但是,符号学系统中原本意义充实、完满的符号在神话这一新意义系统中却重新变成能指,符号的意义在神话系统这里被抽空了,进而变成空洞、贫瘠的能指。

神话系统同样由三项组成——能指、所指、符号。但神话系统中的能指与所指在对应关系上却不再是如符号学系统中那样处于任意性的对应，而是被预先设置好的。能指与所指都是预先存在的部分，而接收者心中的概念进而将这两者画上了等号。那么，神话的特性也在巴特的理论中得到了凸显，神话恰到好处地表达了精心加工的意义，神话促使充满生机的符号指向某个特定的概念，而概念并没有出现在符号系统中，它是先于神话系统的能指就已经存在的，概念将神话的能指导向了所指。

并且，神话系统中的概念并没有藏匿于能指之后，概念与能指都呈现在此，但概念扭曲了曾经作为完满意义符号的能指。倘若将曾作为符号的能指封闭在符号系统内部，那么神话就会恢复充实的特性，具有涉及人类活动与存在状态下的各种可能。但事实恰恰相反，符号变成了神话系统的能指，其原本丰富的含义也被抽空，最终变成一个呆滞且唯一的意义。

可以总结，在神话系统中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的正是概念。而巴特所谓的“今日神话”的概念在当时的语境中有具体的含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作为一个经济学术语，资产阶级在实际上指代的事实早已超过经济的边界而指向政治、文化；但在这些领域中，资产阶级却小心翼翼地除名了，它所利用的手段正是这种神话的表达。资产阶级固有的掠夺与扩张的本质决定了其政治、文化层面的天然劣势，但神话所具有的扭曲的功能恰恰可以掩盖资产阶级的本质，其最具讽刺意味的例子即是某个月薪微薄的打字员在资产阶级神话的幻影中忘怀了自己被剥削与压迫的本质，甚至将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当作未来生活的指向标。

资产阶级的神话表达具有七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承认资产阶级制度的偶然弊端以掩盖其本质之恶；二是摘除神话系统能指中的历史内涵，制造资产阶级无限制消费观念的假象；三是无法容忍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违背的他者的存在，特别在价值评判中后天建构得以形成的主体性；四是采用以权威理由作为挡箭牌的同语反复的手段，在无法解释某些资产阶级的消极现象时，反复地使用某些廉价的形容词汇，甚至用“其之所以这样，在于其本身就是这样”等语式加以解释；五是以类比的方

式，而后表述出针对现实产生的截然不同的双方，并在双方斟酌一番后，最终将二者都抛弃——无须选择，只需担当；六是将一切质都简化为量，从而更加轻易地解释现实（这一手段最多地被运用于资产阶级的审美活动之中，本应关涉内心感觉、直观层面的审美活动却通过电影成本、画展门票等量的概念加以说明）；七是采用箴言、格言式的言说方式，借用元语言解释、说明语言的特点以覆盖、囊括已被造就的资产阶级世界。<sup>[1]180-185</sup>

巴特总结的资产阶级神话的表达特点直指其本质：资产阶级不断地虚构现实世界，防止其逃向另外的存在形式（如共产主义），资产阶级不断地将历史转变为现实。那么于巴特而言，历史与现实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在题为《从历史到现实》（*From History to Reality*）<sup>[10]127-141</sup>的文章中，巴特指出历史是历史学家书写的历史，属于一种话语；而这种话语在生成过程总共出现了两个层面的主体性干涉；第一次是历史学家从事件的亲历者那里搜集亲历者对于事件的描述，而亲历者的主体性经历即对历史书写产生了第一次主体性干涉；第二次则是历史学家们在书写历史的时候，他们出于某些历史哲学的观念将这些碎片化的、多主体性的亲历者话语进行重新组合，那么历史学家个人的主体性也在历史书写中产生了干预作用。并且，历史学家在书写时很少会使用“我”这个主体性的指称，这使得读者在接受历史时被迷惑于一种客观的历史呈现。但是，这种历史的呈现是不可能的。真实的事件不会说话，是历史在说话；历史本身也不会说话，是历史学家在说话。巴特将历史理解为一种隐匿主体性的虚构现实。

资产阶级的神话书写与历史书写也是同样的，他们在其中隐匿了资产阶级的主体性，并且将主体性的观念、思想虚妄地呈现给接受者，并使得神话的接受者们信以为真。

除了揭露神话的本性之外，巴特秉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也同样提出了破解神话的手段——劫掠语言。神话本身就具有掠夺的性质，神话在已经具有完满意义的符号学系统外抽离符号的所指，并将其重新降格为能指，随后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粉饰后重新归还给第二层的符号系统。这个抽离符号后扭曲其意义再归还至符号系统的过程被巴特认

为是一种神话的暴行——劫掠。对于神话暴行，巴特在《神话集》中选择了以暴制暴的破解手段，即对神话系统进行第二次劫掠。

简言之，巴特认为将意义转换为形式即是一种劫掠。神话使得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得以推广和普及，并且在推广过程中对资产阶级的主体性予以匿名。神话可以掠夺所有的表达形式，即便是意义完满的数学公式，甚至与神话相反的现代诗歌也是一样。现代诗歌在巴特眼中是为了在符号系统建立之前探寻前符号状态的语言。但现代诗歌本身极大地赋予能指以尽可能多所指的特性却使其为神话轻而易举地掠夺。巴特提出了另外一种抵制神话的可能——零度。但这种零度是表意的零度，还需特意地说明一下，这种零度并不意味着沉默，毕竟沉默在某些语境下也是一种意义的表达。不表意才是真正的零度，才意味着抵制神话。但这也隐含着巴特的一个结论：没有可以抵制神话的符号系统（除非这是一个不表达意义的符号系统，但如果不表达意义，这又怎么可以称作是一个符号系统呢？）。

依据这条结论，对于神话的劫掠唯有再劫掠的破解手段。在神话系统之上再建立一个新的符号系统，如神话曾经所做的那样对神话进行劫掠，将神话的意义变成第三个符号系统中的能指，借以一个概念将其抽离扭曲后形成新的符号。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第三个符号系统的概念，扭曲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后劫掠神话，在巴特看来，这似乎是破解神话的唯一且完美的手段了。

## 二、“劫掠语言”的深化与发展

格雷厄姆·艾伦认为：巴特1964年在法国《交流》杂志上发表的理论文章《符号学原理》（*Elements of Semiology*）是《神话集》思路的进一步深化，直到1967年《时尚体系》（*The Fashion System*）的出版，这才表明了巴特开始质疑自己关于“神话”的符号学方法。<sup>[11]</sup>

巴特在《符号学原理》中借用了索绪尔所采用的二元对立的理论框架“语言与言语”“所指与能指”“组合与系统”“直指与涵指”，表达了建设符号学科学的理论构想。

《符号学原理》是巴特运用语言学理论对《神

话集》破解神话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在其中，巴特借用了叶尔姆斯列夫对符号系统进行表达平面和内容平面的划分，建立了一个类似于索绪尔所说的“能指、所指、符号”的结构，这个结构由表达平面、内容平面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组成。<sup>[12]68-72</sup>但是，巴特在此运用的新术语并没有离开《神话集》中破解神话的思路。巴特明确表示：一个完整的表达平面、内容平面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变成一个新系统的单一表达平面或内容平面。<sup>[12]69-70</sup>不难发现，这实际与《神话集》中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变为一个单一能指的思路是一样的。只是叶尔姆斯列夫的思想帮助巴特认识到完整符号系统不仅可以作为单一的能指，也可以作为单一的所指。

《符号学原理》不仅是从理论结构上对《神话集》的延伸，其结论同样指向了以“劫掠语言”的手段来破解神话。因为这个由某完整符号系统成为表达平面或内容平面的新系统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sup>[12]70</sup>并且“没有什么可阻碍一个元语言反过来成为一个新元语言之对象语言”。巴特在此所说的新元语言即是指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符号系统可以通过第二次的劫掠将其变为一个单一的表达平面或内容平面。

另外，巴特在《符号学原理》中对语言学与符号学的际属关系的认识很有见地。当初索绪尔提出符号学构想时明确指出：语言学应隶属于一门除人类语言以外同时研究其他符号系统的符号学。但巴特在《符号学原理》中却颠倒了这种关系，他认为符号学应该隶属于语言学；这是因为巴特认为任何符号系统在涉及意义表达与传递的过程中都无法避免地需要语言介入。其实，巴特对符号与语言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在其解释图片何以成为一种神话时就可见端倪：他认为解读图片的过程中不断地存在语言的介入。

实际上，对符号与语言的关系的认识影响了巴特神话思想的建构框架。在《神话集》中，神话研究的对象十分驳杂，包括图片、文字、语言、行为等等；但在《符号学原理》中，巴特进一步地缩小了研究范围，其研究对象为语言及同语言相关的部分文化系统；直到《时尚体系》，神话的研究对象变成了时装界的语言。对此，菲利普·罗歇总结：巴特在《今日神话》《符号学原理》《时尚体

系》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取舍，即巴特的研究对象不再是热门的社会话题，而是语言。

对于这个问题，巴特自己的解释是很直白的，他写作《时尚体系》的最初目的是为获取博士学位。当巴特在请求列维-斯特劳斯作为自己的博士生导师时，列维-斯特劳斯选择了拒绝，但他给予了巴特一个建议，要统一研究对象为时尚杂志讨论时装的语言。虽然《时尚体系》最终并没有帮助巴特获得博士学位，但这是巴特神话研究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思考，也是巴特运用符号学理论破解社会神话的标志。

在《时尚体系》中，巴特进一步运用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等语言学家的理论，力图分析“流行服饰”这一神话系统。时尚话语支配的并不是服装实体，而是服饰特征的符号意义。<sup>[13]</sup>所以《时尚体系》研究的是作为能指层面的服饰特征如何变为一种时尚意义的意指过程，即时尚神话的生成过程。巴特将时尚的符号系统区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直接意指系统，另一个是隐含意指系统。这两组符号系统的区别在于：作为能指的时装语言与时尚之间的关系。直接意指系统的所指即是流行，而隐含意指系统的所指则先指向服饰的某种社会功能，如：保暖、闲暇、富有等，然后这些社会功能再意指流行。

隐含意指系统则会导致异化。异化本是一个哲学术语，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所说的异化主要是指劳动本基于人类而产生，是人类存在的本质状态；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人类所产生的劳动反过来约束、钳制了工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人类的存在。而巴特在隐含意指系统中所说的异化是指那些服饰的功能性语言本是从服饰功能中所产生，但在流行体系中却反而控制了服饰的形式、质料。

直接意指系统则会导致意义的失落。相较于隐含意指系统，直接意指系统在能指与流行之间没有了过渡性的功能性所指；能指直接意指流行，服饰的其余意义在此是失落的，服饰仅是流行的象征，而告别了其可能存在的其他意义。直接意指系统的这种武断特质使得流行服饰每年都可能发生天翻地覆地剧烈变化，从而为服饰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市场需求。

无论意指过程是否有社会功能的意义介入，这两组意指系统的最终所指均是时尚。相较于《神话集》，巴特在《时尚体系》中更注重对于“时尚”这一神话的社会功能的挖掘。在巴特看来，“时尚系统”的目的是经济层面的，即刺激还拥有不曾破损的衣服的那些消费者跟随“时尚神话”继续消费以维持服装业的生产、消费、再生产的运行逻辑。

当巴特重新审视《时尚体系》时，他表现出了与回顾《神话集》时同样的态度。巴特希望读者们在《时尚体系》中看到的不是一种确凿的理论，也不是一种准确的调查结果，而是一种成长的轨迹。确实，相较于《神话集》，《时尚体系》运用了更广泛、更准确的语言学理论对“神话”进行解析。《时尚体系》如一个精巧的理论玩具，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时装神话的破解和劫掠。

除了自身的思想发展以外，一些外部因素也导致了巴特的思想转变。法国语言学之父马蒂内的两位弟子：普里埃托和穆南，他们以索绪尔的符号学思想与比利时语言学家比桑斯的研究作为理论基础，界定了正统的符号学——语言学家的符号学。<sup>[8]187</sup>穆南强烈地反对巴特将象征、隐喻等概念与符号概念的混淆。因为在索绪尔那里，符号具有非理据性的特征，而隐喻、象征则是理据性的：喻体与本体之间总是存在某种相似性，而能指与所指之间应当是任意的、非理据性的。照穆南的思路，巴特破解神话的研究并不属于符号学范畴，对此他直言不讳：“巴特进行的不是符号学研究，而是社会精神分析。”<sup>[8]188</sup>

巴特显然被这些根正苗红的符号学家驱逐了，不过巴特自身的思想也离传统的符号学愈发遥远。

### 三、“解放能指”的写作实践

1967年，《时尚体系》出版之后，巴特进一步谈到《神话集》与《时尚体系》中的理论缺陷：“一种与不坦率承认自己是符号系统的那些符号系统相关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弊病”<sup>[14]68</sup>。巴特在此指明了，无论是《神话集》或是《时尚体系》本身与其希冀破解的社会神话存在某些相似性，社会神话借助报刊、电影等言说、宣传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神话集》《时尚体系》则是借助符号学理论作

为精巧工具在替抨击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说话。那么,从形式上而言,这两者之间无非不过均为一场暴政,一种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宣传。巴特反思性的理论态度是具有前瞻性的,一年后,法国爆发了对全世界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与启示的“五月风暴”。

出于对当局政府的不满,法国学生在工人、商人等社会力量的支援下于1968年爆发了以罢工、游行、筑造街垒为主要形式的反政府行为。与萨特、福柯等法国思想界巨擘截然不同,巴特没有选择上街游行与声援学生,而是提出了那个充满话题性的口号:“结构不上街”。当然,与法国思想界、学术圈公然违逆的态度也使得巴特被迫地离开了巴黎,但巴特对于“五月风暴”的态度并非仅如卡尔韦所说是天性使然(巴特不喜欢游行一类歇斯底里的东西)<sup>[8]168-170</sup>;而是巴特反对这些并未看清资本主义本质的学生在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帜下言说一场新的神话。

巴特所希望的是“必须把努力推向更远,必须试图分裂——不是分裂符号,而是分裂有关符号的观念本身”<sup>[14]88</sup>。在表意系统中,当某些符号指向了一个具体的意义时,这些符号就会帮助人类去认识这些符号所指向的事物,但是这些符号也因此阻挡了人类通过“感性”的身体去认识这些事物本身,而支配这些表意符号的正是巴特所说的“观念”。这些观念即是《神话集》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时尚体系》中时尚业利益和“五月风暴”中学生对当局政府的不满。这些观念钳制了自由的人类实现感性解放自身的可能。从这个角度而言,巴特的思考与《巴黎手稿》中的青年马克思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相较于马克思从身体角度谈到的“感性解放”,巴特还是在自己熟悉的符号领域提出了“能指解放”<sup>[10]65-68</sup>。

1968年,在破解时装的神话之后,巴特在《占卜术》杂志上出版了被视为其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思想分水岭的理论文章《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继续从神话的角度来看,这篇文章是巴特对破解写作神话的尝试:“为使写作有其未来,就必须把写作的神话翻到过来”<sup>[15]301</sup>。但在《作者之死》中,巴特一反常态,他并没有以符号学的精巧理论来破解写作神话,而是从言语活动和写作活动两个层面进行思考。

“言语活动认识主语,而不认识个人”<sup>[15]297</sup>,在言语活动中,不需要个人的充分感受、认识、实践便可以完成言语的运转;语言规则、意识形态在支配着说话的人。巴特在其自述集《罗兰·巴特论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by Roland Barthes*)中表示:“他(巴特)倾向于一个写作原则,即写作主体被语言所影响。”<sup>[16]79</sup>在言语活动中,对话者的主体性是被建构的;在写作活动中,作家的主体性也是被建构的。自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来对作家主体性的重视,这使得作品在某位作家的署名之下被赋予了固定的所指。那么,要破解言语的控制与写作的神话,必须瓦解中世纪以后的作者的观念。这与巴特在《声音的种子》要求破解支配意指作用的观念是遥相呼应的。

文本(text)的本义是一种织物,而写作就是在各种引述中完成对于文本的补缀。作者是被支配的,所谓的主体性只是规则、观念共谋的产物。以“劫掠语言”的手段破解神话只不过是打破上一种观念的束缚后又加以新概念束缚之。这种无限循环的过程类似于巴特在《时尚体系》末尾对符号学家本质的认识:每一种基于符号的解码都会成为新一轮解码的符号。在《作者之死》后,对破解神话持有“解放”态度的巴特对这种欲盖弥彰的破解方式失去了信心。

对于能指的解放,巴特进行了一些写作上的尝试,例如1970年出版的《符号帝国》。这是巴特在日本旅行时的一些所见所感,其写作的方式没有如《神话集》《符号学原理》《流行体系》一样运用大量的符号学理论作为阐释工具。相反,巴特并不掌握日语,也并不了解日本文化。他是以一种丢失意义的感悟的方式来认识日本这些符号的。正是因为不掌握日语,不了解日本文化,所以语言和日本社会变成了声音和图像,巴特在此释放了自己感官,尽情地享受空洞的能指,从而达到其所谓“在言谈中,把主体从一种自缚的情况下解救出来”<sup>[17]</sup>的境况。基于无法了解声音、图像背后的意义,巴特认为这种空洞推翻了符号对于个人的统治。

巴特在日本这个没有固定所指的符号王国尽情地徜徉。他将东方筷子和西方的叉子作比较,筷子象征一种调和,而叉子则是一种掠夺。连日本的城市建设在巴特看来都是一种没有中心的空洞的符



号，他在其中获得了解放。《符号帝国》是巴特最喜欢的一部作品，和服、天妇罗等日本符号都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当然，其中还有其不断引述和评论的俳句。巴特对于俳句的评价与其在《神话集》中对西方现代诗的评价很类似，他也认为俳句并不是追求符号系统之后的意义，俳句是在勾勒符号系统之前的存在状态。《符号帝国》中，我们看不到巴特早期思想中劫掠语言的构想，转而变为利用感性解放能指的实践。

巴特在1970年时将《符号帝国》的解码方式称为一种符号的伦理学，甚至认为这种伦理学为其他文明提供了典范，巴特在日本看到了西方理性文明的局限，结合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前后事件的感闻，他倡导一种新的感觉方式，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不指向任何所指，特别不指向任何最后的所指。”<sup>[14]86</sup>《符号帝国》是巴特解放能指的一次愉悦的尝试，在其中巴特没有理论性地总结能指解放的具体方法，而是提供了并不唯一的实践方式的例子。

#### 四、“解放能指”的理论总结

关于“解放能指”的理论总结被巴特放进了另一部作品——《文本的愉悦》（*The Pleasure of The Text*）中。与《符号帝国》不言及理论相反，《文本的愉悦》通篇都在论述巴特关于符号学理论的新思考，其中表现出了巴特对于阅读活动中读者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的重视，或许这是巴特对《语言的窸窣声》中谈到的“阅读科学”的一种注脚。

巴特作品的英译本翻译者理查德·霍华德意识到在巴特的整个思想脉络中，《文本的愉悦》中对于写作、阅读的快乐追求与巴特在《神话集》《时尚体系》中谨慎的意识形态分析和符号学分析是格格不入的。<sup>[18]7</sup>在《文本的愉悦》中，巴特指出神话是基于某种动机、某种意图和某种需要而产生的语言泡沫。那么其早期“劫掠语言”的破解神话构想无异于是将泡沫砸向泡沫，其最终获得的都是短暂的某些幻影。“政治主张植入了语言的拆解，拆解语言被古老的能指文化所包围”<sup>[18]8</sup>，这样的总结无异于宣判了“劫掠语言”的破解神话手段的死刑。某些符号学家和巴黎街头筑造街垒的孩子们都在从事这种搭建泡沫的工作。

破解神话的方式在《文本的愉悦》中指向了

获取愉悦。文本的愉悦来自于写作或阅读活动中，尤其是阅读活动中发生的动摇、范式的更改和意思的不稳定。那么具体的做法即是将读者从阅读活动中解放出来，让读者在阅读的活动获得愉悦。但是，巴特所极力推崇的并不是愉悦（pleasure），而是极乐（bliss）。

读者所获得的愉悦与极乐是不同的，愉悦可以通过社会的建构或某些与意识形态相关的观念所导致，但是极乐指向了感性的极致——性，或者说被巴特称为色情的东西。对应的，意识形态具有重复性与一致性的特点，但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分析也恰恰需要用重复与一致来表明其合法性；所以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本身就会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成为一种神话，打破这种方式只有一个途径：美学或色情的解决方式。<sup>[16]104-105</sup>但是，巴特的色情并不是指裸露，而是一种在衣裤的遮掩下露出的肌肤。这样的论断与巴特在《神话集》中谈到“脱衣舞秀”时的表述是一样的。实际，巴特的色情论不妨理解为一种罅隙或者某些与感性相关的空间。巴特需要在这些空间之中激活被语言、观念、传统所遮掩的感性自我解读、自我实践的可能。

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的意义是无限催化的，但是言语活动一类的语言实践会终止这种催化，所以巴特认为意识形态活动的语言是一种已被催化的语言。<sup>[18]50</sup>神话无异于也是一种被终止催化的语言，而与催化相连则是文本的极乐；极乐延续与存在的前提是语言催化活动的进行，那么以神话劫掠神话的方式当然会被抛弃，而解放能指是催化语言意义进而获得极乐的根基本方式了。“这就是文本的乐趣；价值转移到能指的豪华等级。”<sup>[18]65</sup>这一阶段的巴特思想并不是汪民安等学者所定义的享乐主义的文学观，而是一种借以释放读者最具有个体性的感官以获得快乐和解放的破解神话与语言弊病的思考。当然，其中也体现出了《符号帝国》的写作实践对巴特理论总结所产生的影响，巴特在《文本的愉悦》中还强调对于异文化的包容和尊重，这也是获得解放的一个重要前提。

巴特认为当下对于资产阶级语言的解构与拆解仅会让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控制民众思想，这不过是一场新的神话，而不能实现解放与个体自由的目的<sup>[16]63</sup>，所以他选择了追求愉悦与极乐的自我解构方式。



当巴特回顾其作品时,巴特将《神话集》定义为受马克思、萨特、布莱希特影响下写作的社会符号学,而《符号学原理》《时尚体系》则是受索绪尔理论影响下写作的符号学,《符号帝国》则是受德里达、索莱尔斯、克莉丝蒂瓦的解构主义和文本性理论影响下写作的。巴特将《文本的愉悦》与《罗兰·巴特论罗兰·巴特》称为受尼采影响下的符号的道德。<sup>[16]145</sup>在这种符号的道德中,意义的自然性开始发生转移、开始出现裂缝,事物开始朝向真正的意义前进;但在符号道德中,这种意义不允许变成固定的、不变的,正是这种不断变动的意义使得符号的意义可以被调和包容。<sup>[16]97-98</sup>巴特从“劫掠语言”到“解放能指”的思想转向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原因所造成的:一是“五月风暴”事件对于巴特的刺激,作为事件亲历者的巴特在其中看到了学生强行劫掠了马克思主义、毛主义作为武器和口号在其中所施行的一种新的充满重复性与排斥它者的暴政,巴特对于学生的活动是抱有反思性与批判性的;其次是德里达解构主义和克莉丝蒂瓦的“互文性”理论对于巴特的启示,德里达捕捉到了西方思想传统中的“理性中心主义”与“语音中心主义”不仅把握住了西方思想传统中存在的缺陷,而且启迪了巴特借异域文化、东方文化以补充调和西方思想中的缺陷,而克莉丝蒂瓦的“互文性”发现则让巴特对于写作活动、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全新的思考,在个体性趋于消弭的写作活动中,如何实现自我的解放成为导向“解放能指”一个箭头;最后,不得不说穆南等的传统语言学家对于巴特理论的驱逐也刺激了巴特自主寻求理论创新。

从《神话集》《符号学原理》《时尚体系》《符号帝国》一直到《文本的愉悦》和《罗兰·巴特论罗兰·巴特》,巴特对于神话的思考贯穿始终:从最初运用“劫掠语言”的手段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破解,到后来反思符号与具体事物之间的差异进而研究神话的语言,到最后采用“解放能指”的手段在能指与所指的罅隙间完成感性的自我解放,巴特在其中都围绕破解神话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的确,如巴特自己所说,“解放能指”更近乎是一种符号道德,其不是纯粹理论角度出发演绎或

是概括,而是一种具有强烈的自我解构、自我反思倾向的理论主张。就此而言,后人学者也并不应该将“解放能指”作为破解神话或思考意识形态话语的最终结论,而是继续在反思与批判之批判的过程中,如巴特一样结合时代的具体情况进行思考和进一步的探索。

#### [参考文献]

- [1] 罗兰·巴特. 神话修辞术 [M]. 屠友祥,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 [2] 乔纳森·卡勒. 罗兰·巴特 [M]. 陆贇,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 [3] ROLAND B. Mythologies; Essais [M]. Paris; Seuil, 1957.
- [4] 王铭铭. 神话学与人类学 [J]. 西北民族研究, 2010 (4): 67.
- [5] 罗念生, 水建馥. 古希腊汉语词典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558.
- [6]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 [M]. 高名凯,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22-24.
- [7] ROLAND B. Mythologies [M]. ANNETTE L, Tran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72.
- [8] 路易-让·卡尔韦. 结构与符号: 罗兰·巴尔特传 [M]. 车槿山,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 [9] 菲利普·罗歇. 罗兰·巴尔特传 [M]. 张祖建,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55.
- [10] ROLAND B. The Rustle of Language [M]. RICHARD H, Trans.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 [11] 格雷厄姆·艾伦. 导读巴特 [M]. 杨晓文,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5: 54-55.
- [12] 罗兰·巴特. 符号学原理 [M]. 李幼蒸,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 [13] 罗兰·巴特. 流行体系 [M]. 敖军,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2.
- [14] 罗兰·巴特. 声音的种子 [M]. 怀宇,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 [15] 罗兰·巴特. 罗兰·巴特随笔选 [M]. 怀宇,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 [16] ROLAND B. Roland Barthes by Roland Barthes [M]. RICHARD H, Trans. London and Basingstoke: The Macmillan Press, 1977.
- [17] 罗兰·巴特. 符号帝国 [M]. 孙乃修,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出版社, 1994: 7.
- [18] ROLAND B. The Pleasure of The Text [M]. RICHARD H, Tran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5.